

奏响共筑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

本报特邀评论员 周树春

中非合作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给不安定的世界带来重要的正能量，以不断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事业的新篇章，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每周时评

金秋时节，中非友好大家庭时隔6年再聚北京。作为近年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以“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9月4日至6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峰会通过《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作为一次承前启后、守正创新的会议，此次“北京峰会”回顾中非友好历程和论坛成果进展，就加强中非全方位各领域合作达成明确政治共识，为中非关系开辟新境界作出新设计，为中非合作开启新征程汇聚新动能，是新时代中非合作新的里程碑，对中国和非洲乃至世界发展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确立“新定位”，释放出在世界变局中携手共进的强烈信号。源于文明多元交流、始于中非友好往来的中非友好，穿越时代、跨越山海、薪火相传，经过近70年辛勤耕耘，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共同的历史遭遇、

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中非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和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在总结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上，此次峰会明确，中国同非洲建交国实现“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中国与非洲的整体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标志着中非传统友谊再深化、互利合作再升级，中非关系迈向新高度。在中国外交整体布局中，非洲是“基础中的基础”。在动荡变革的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坚持风雨同舟、并肩前行，携手推进合作共赢、和合共生、文明共兴，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国际舞台上密切配合，对处于各自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和非洲意义重大，对促进全球和平发展影响深远。

擘画“新蓝图”，展现同行现代化征程的坚定意志。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和非洲的共同任务，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和非洲是同行者。公正合理的现代化、

开放共赢的现代化、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多元包容的现代化、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和平安全的现代化——“六个现代化”阐明中非共逐什么样的“现代化之梦”。文明互鉴、贸易繁荣、产业链合作、互联互通、发展合作、卫生健康、农农惠民、人文交流、绿色发展、安全共筑——“十大伙伴行动”标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延续和拓展此前的“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九项工程”，这次“北京峰会”为中非在奔赴现代化历程中实现共同发展给出了新的“路线图”，开辟了中非关系更加壮丽的前景。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蕴含巨大潜力，必将迸发出巨大能量。一方面，各为14亿多人口的中国和非洲，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互为机遇、互利共赢、互相成就，符合中非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另一方面，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28亿人携手现代化的蓝图必将改写世界现代化的版图，绘就人类发展新史上新画卷。

谱写“新篇章”，点亮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南方时刻”。“北京峰会”以中非共谋发展的鲜明姿态，彰显了“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奋发进取的坚

定信心。作为全球最年轻、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以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实现整体性大发展，非洲将进一步成为充满希望的大陆。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必将成为引领“全球南方”加快群体性崛起的绚丽篇章。以中国和非洲为重要代表的“全球南方”蓬勃发展，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北京峰会”以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响亮声音，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大势。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先行者，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中非携手共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必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重要的典范。当前世界格局深刻变革，尽管前进路上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困难甚至惊涛骇浪，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中非合作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给不安定的世界带来重要的正能量，以不断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事业的新篇章，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微评

新闻事件：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于9月5日起施行。修正后的慈善法实现了对慈善组织的募捐、个人网络求助的全面规范和监管，特别是将个人网络求助纳入监管范围，填补之前的法律空白，实现“两条腿”走路。作为新慈善法的配套规章制度，民政部5日公布了新修订的《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其中严格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认定标准。同一天，民政部等5部门还联合公布了《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

点评：立法不足以自行。全面推动慈善事业良性发展，需要不断健全慈善监管制度机制，通过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保障慈善法的正确实施。

新闻事件：国家发改委、商务部8日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新版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31条减至29条，删除了“出版物印刷须由中方控股”，以及“禁止投资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煨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2个条目，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

点评：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充分彰显了我国扩大国际合作的积极意愿和支持经济全球化的鲜明态度，将有利于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国内市场良性竞争。

新闻事件：商务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在生物技术领域，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

点评：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举措意味着中国在医疗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这将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医疗健康产业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新闻事件：近日，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反映，因天气炎热，湖南湘潭县天易金霞小学要求家长捐赠空调。9月5日，湘潭县教育局发布通报，称网传情况属实，已责成学校回购所捐空调，后续将依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此外，湘潭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家并未要求学校一定要在教室安装空调。捐赠行为是家委会发起的，纯属自愿，教育局不会统一安排。

点评：在极端天气增加的今天，如何确保学生们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考虑应急预案了。

新闻事件：近日，超强台风“摩羯”登陆海南，为确保怀孕38周以上的孕妇台风期间的安全，当地卫健委、医院和社区联合发布了“点对点”的通知，鼓励她们免费到住院，并对高危孕产妇开通绿色通道实现应收尽收。

点评：细节里见真情。此次海南省在台风来临前对孕妇的关怀行动，展示了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时的应急能力和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

（本期点评：王慧峰）

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 服务城乡融合发展

杜海峰

在新时代城乡融合的背景下，要系统把握农民工流动的规律和新态势，深入剖析农民工流动的意愿、行为和后果，进而更好完善和制定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的政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委员说话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农民工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9753亿人，成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产生着现实而深远的影响。

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是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劳动力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农民工是城乡融合的桥梁。城乡融合发展，在微观上是城乡居民家庭特别是农民工及其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人口压力是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动因，其中经济差距是人口流动热潮的主要原因。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大多数农民生计的主要手段，广大农村人口千方百计地克服人口流动中巨大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涌向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是为了自己、家庭和子女更好地生存、生活和发展。需要关注的是，城乡人口流动已持续了40多年，农民工的群体内部的代际之间也悄然发生着重要变化：第一代农民工相比，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父辈那样作为城市的“过客”，而是更希望永久定居城市、更多参与城市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

从多角度、多维度认识农民工流动，可以观察到如下新特征。第一，我国人口发展发生重大转向、家庭功能弱化、家庭发展能力不足成为中国人口社会环境的新常态，给农民工流动带来深远影响。一方面，少子老龄化成为人口新常态，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结束，劳动力老化不可避免。作为净流出地的中西部农村将面临存量减少、增量不足的现实困境，直接影响农民工流动趋势。另一方面，全国家庭户规模朝极小化发展，女性生育意愿不高、农村家庭的托幼养老功能弱化，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缺乏照料成为部分农民工流动的新“拉力”和回流返乡的

诱因。第二，在国际国内环境复杂演化过程中，亟须加强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发展韧性，从社会政策层面支持和促进农民工个体人力资本提升、保障家庭发展能力提升。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化解外部风险的重要保障，通过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来强化家庭功能，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弥合流入流出地发展差距，积极构建家庭友好型的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优质均等的制度安排。第三，剖析新技术、新业态与农民工流动的相互关系与影响机制。随着我国迈入数字经济时代，平等分享“数字红利”的目标尚未实现，要关注“数字鸿沟”等因素给农民工带来的冲击，这也将直接影响并形塑农民工流动的新特征和新趋势。

中西部县域既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也是城乡融合的主战场。城乡融合发展在宏观战略上需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在全国国内要实现东西部的均衡，东部城乡差异普遍较小，是农民工流动的流入目的地，中西部城乡差异相对较大，是农民工最主要的流出地，农民工由中西部向东部的流动，既是“推拉”等人口迁移流动理论的现实呈现，也是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解决路径。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更好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战略，需要将农民工流动问题的认识聚焦到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县域。县域通过城乡间的物流、人流、信息流，不断缩小城乡差别；县域大部分地区属于农村，是农民工的流出地，只有县域消弭了城乡差异，实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解决农民工流动的“后顾之忧”；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农民工流动政策和措施均聚焦县域，特别是提出要统筹发展县域经济，引导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返乡创业，以试点县为单位，开展返乡创业试点的经验总结和推广，是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的重要举措。

因此，在新时代城乡融合的背景下，要系统把握农民工流动的规律和新态势，立足流出地县域特别是西部县域，深入剖析农民工流动的意愿、行为和后果，进而更好完善和制定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的政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精准建言

西部地区创新发展资源配置体制改革，需要大胆试、大胆闯、主动改，切实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在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上取得新突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是指引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彰显了党中央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新宣示，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重要纲领性文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决定》把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作为一项重大改革任务来部署推进，明确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关键改革举措。深化资源配置体制改革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也是西部地区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地区改革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明确支持贵州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这是贵州等西部省份加快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但从实践来看，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要素资源保障存在短板、科技支撑能力还不强、产业转型升级比较慢、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足、民生保障水平不高等。

西部地区创新发展资源配置体制改革，需要大胆试、大胆闯、主动改，切实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在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上取得新突破，推动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第一，积极承接要素资源和产业转移。一是促进要素流动。创新跨区域产业协作优化布局机制，支持东部集中度过高的重点产业新增产能向西部合理布局，推动东西部在产业、技术、人才等方面深化合作，建设一批对口协作重点园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创新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跨区域流转衔接具体办法，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源共享，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二是推动对外开放。支持西部地区打造国际物流和跨境产业合作网络，鼓励并引导大型企业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在相关国家率先建立海外仓等营销和服务体系。加强与国际组织、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最大化借助国际资源和力量推动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三是改善营商环境。西部地区结合实际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招商引资政策，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第二，降低生产要素成本。一是降低用电用气成本。支持西部地区建设一批地方电网电源项目和输电通道项目，大幅提高电力供给能力。支持火电企业机组等容量替换，新上火电项目按照超临界机组进行规划建设，进一步降低火电企业发电成本和工业初级产品生产企业用电成本。建立常规能源电力为新能源电力消纳提供义务调峰和有偿调峰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允许风能、光伏发电企业参与电力直接交易，探索开展风光消纳指标、电力绿证交易。实施源网荷储一体化、能源数字化试点，建设能源数据中。加快推进西部地区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保障气源充足和 gas 价格合理稳定。二是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支持西部地区重点高速公路、铁路、水运及港口码头项目建设，构建水铁公一张网、港产园一体化的多式联运体系。允许通过适当延长高速公路收费年限降低收费标准的同时，增加铁路货运指标、科学安排货运计划、合理降低货运收费标准。提高500吨级船舶制造能力，完善通航调度合作机制，真正让水运低成本优势发挥出来。三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大对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提高西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调配信贷资源，制定针对西部地区融资担保行业的差异化扶持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支持力度。

第三，充分释放优势产能。一是释放资源产能。进一步调整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合理确定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三线”界限，保障重要矿产资源能够得到科学有效开发利用。可在资源省份开展矿产资源成矿管理和成矿预测、探测、勘探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建立矿产资源储备体系。二是释放生态产能。国家层面统筹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支持西部地区率先开展碳汇交易试点。西部喀斯特地区可开展岩溶碳汇本底调查、碳储量评估和潜力分析，把岩溶固碳能力纳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体系。根据各省生态质量核算排放指标，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同步将东部沿海省份的排放指标配置给西部省份。三是释放数据产能。大力推进“东数西算”战略实施，对西部地区数据中心统一给予电价优惠，带动更多数据和算力企业落户西部。

第四，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帮扶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二是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支持西部省份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快把旅游业打造成为区域支柱产业。三是促进和美乡村建设，推广先进的经验做法，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主席）

加快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

赵永清